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第二十九辑

非外借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第二十九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 第二十九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309-13037-9

I. 中… II. 教…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2582 号

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九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291 千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037-9/I · 1050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陈尚君

副主编 陈维昭 黄仁生 朱 刚

编辑部主任 罗剑波

编 委 (排名以拼音为序)

陈广宏 (复旦大学)

陈国球 (香港教育学院)

陈 洪 (南开大学)

陈庆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陈尚君 (复旦大学)

陈维昭 (复旦大学)

陈文新 (武汉大学)

陈引驰 (复旦大学)

崔溶澈 (韩国高丽大学)

大木康 (日本东京大学)

董乃斌 (上海大学)

杜桂萍 (黑龙江大学)

关爱和 (河南大学)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

黄 霖 (复旦大学)

矶部彰 (日本东北大学)

金文京 (日本京都大学)

李 浩 (西北大学)

廖可斌 (北京大学)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泰来 (美国芝加哥大学)

莫砺锋 (南京大学)

孙 逊 (上海师范大学)

谭 帆 (华东师范大学)

王瑗玲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王靖宇 (美国斯坦福大学)

魏浊安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吴承学 (中山大学)

项 楚 (四川大学)

姚 申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部)

詹福瑞 (中国国家图书馆)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

郑杰文 (山东大学)

郑利华 (复旦大学)

朱 刚 (复旦大学)

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笔谈	(001)
--------------------	-------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守正出新	黄 霖(003)
-----------------------	----------

“中国文论”焕发青春	王汝梅(010)
------------	----------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价值	李建中(013)
------------------------	----------

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创新	袁济喜(018)
-------------------------------	----------

中国文论研究的传承与开拓	(023)
--------------	-------

论宋代古文运动之崛起及其特有之文化史意涵	戴景贤(025)
----------------------	----------

评点、诠释与接受——晚明清初戏曲评点之批评语境与其理论意涵	王璦玲(035)
-------------------------------	----------

场屋的舞台艺术——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秀才秘笈》	陈维昭(080)
---------------------------	----------

中和之道：唐文治先生《诗经大义》诗教旨要	邓国光(088)
----------------------	----------

《民国日报》中的报刊诗话创作	李德强(104)
----------------	----------

日藏汉籍研究	(117)
--------	-------

王梵志诗集在日本——兼论山上忆良与杜甫诗的关系	静永健(119)
-------------------------	----------

- | | |
|---------------------------------------|----------|
| 日本内阁文库藏《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考 | 黄冬柏(130) |
| 正仓院古文书所见汉籍书录及唐逸诗汇考 | 陈 翀(166) |
|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用中注《骆丞集》十卷本叙录 | 杜晓勤(173) |
|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七经孟子考文》发微 | 顾永新(177) |
| 北魏皇室文学雅集考论 | 罗建伦(187) |
| 倾城·谏诤·长恨——吕向《美人赋》的玄宗谏诤及其与白居易诗、陈鸿传奇的对读 | 许东海(197) |
| 论新见四川清代文言小说《茗余新话》 | 汪燕岗(213) |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笔谈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守正出新

黄霖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文论史》”)在十二位编写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出版了。这里想谈谈我所体会的这本书是怎样努力守正出新的问题。

当这个项目立项时,我首先考虑的是,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教中国文论史?学生要学中国文论史?这是一个“教”与“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目的不明,方向就不清。古代搞中国文论最有成就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谈过他研究文论史的目的是: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珉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在不满足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实际上提出了他的目的是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总结传统,以有益于“后生”。这比起后来的一些人提到编写文论史的目的来,显然能观“衢道”而不偏于“隅隙”。^①实际上,我当年走上学习、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道路时的初心,就有一个“文论民族化”的情结。1963年,那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自独立以来学界真正自觉地关注文学理论民族化的时候,一时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复旦大学又是研究中国文论史的重镇,当时拥有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赵景深先生等一些大家,这就使我决定报考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师从朱东润先生学习。历史在曲曲折折中走过了半个世纪,到目下,中国文论的体系,其构架、思维方法、话语表述的主色调无疑还是西方化的,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是关系到整体国力、扭转自甲午战争以来民族自卑的心理,以及文化软实力的诸多方面,并不是一朝一夕

^① 如纪昀编《四库全书》的“诗文评”时说为了“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郭绍虞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时说“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

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们应该努力去承传与发扬中国优秀的文论传统,通过“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去“述先哲之诒”,以“益后生之虑”。因此,我们教学中国文论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重建富有民族特色,又立足当今现实,并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中国文论体系而作一点努力。

从这个根本目标出发,那如何使学生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呢?现在高校的中国文论史课程,一般只有一学期,每周二节课。时间这么短,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当前的教学秩序;另一方面要能使学生了解与把握中国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从这一实际出发,决心突破百年以来“文论史”的编写模式,不以人物与作品立章节,讲许多重复或枝节的内容,而是以范畴与命题立了5章19节(每章概述不算)61目,让学生直截了当地了解中国文论中的这些最基本的话语、范畴、命题。这一突破,当然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有人担心,这样是否会搞成一本范畴论而不成为“史”了。为了解决论与史的矛盾,我们在几个层次上加强了史的描述:一是全书还是以朝代先后为序分五个阶段加以论述,在《绪论》中作了总的梳理;二是每一阶段作为一章,专立一节《概述》,分段再将史的背景细化,加强历史文化背景的铺垫,如分别讲先秦的礼乐文化,汉代的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对言意关系问题的探讨与论辩,唐代三教合一的政治、哲学、宗教的氛围,明清时代陆王心学、市民阶层的壮大等,增强了历史感;三是在论述每一个范畴或论题时,注意上下勾连,理清来龙去脉。这样处理后,全书的面貌还是能清晰地给人以“史”而不是“论”的感觉了。也有人担心,这样以论题为纲,不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学了半年后,是否会使学生对一些重要的文论家与文论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甚至连《文心雕龙》也不知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了?为此,我们用插页的形式,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作了专门的介绍,并且还各自附上一图,做得图文并茂,无意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增强了阅读的兴趣。通过诸如此类的补弊而救正,保证了这部文论史的编写模式的出新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要使文论史能出新,不仅仅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从编写文论史的根本目的出发,在内容上要下“出新”的工夫,恐怕就在于如何把握与说清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与主要特点,而不是去用中国的文论词语去填塞西方理论的框架。

我认为,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是“原人”,即中国文论的基点是立足于“人”。当然,在历史上没有人直接以“原人”来论文,打出的旗号都是“原道”。但假如对各种牌子的“原道”一作具体分析,其实质还都是原人。这是由于建筑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基础上的观念与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所坚守之“道”与“天人合一”等观念交织在一起,自然的会都指向“原人”。儒家是将伦理关系视为政治制度的基础,讲究“人伦”是社会意识的核心。孔门所强调的复“礼”与归“仁”,实际上都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礼”即是伦理道德的具体规范,“仁”就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都是为了处理好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知北游》曰:“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都不是将人作为独立于天地之外的存在,而是作为自然之物。老庄所宣扬的“无为”“寡欲”“坐忘”“心斋”等,都是希望能消除物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吾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归根到底,

都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道两家的“道”，不论是着眼在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为中心转，所以，他们的原道，归根到底都会指向原人。

那么中国文论“原人”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用“文自人”“文似人”“文写人”“文为人”几个方面来加以概括，也就是作文、论文都是以人为中心。

关于“文自人”，我们看中国古代文论中最权威的《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说：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所谓“天地之心”，语出《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正义》释“天地之心”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三才”中“人居其中央”；二是“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三是“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藏之最圣者也。”这也就是说，人是天地的核心、灵魂。《文心雕龙·原道》之后，又有《征圣》《宗经》两篇，进一步申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道理，突出了作为“人”之精英的“圣”在“道”与“文”之间所起的关键的、核心的作用。圣人周公、孔子的作品作为“经”，即是验证文自人、人原道的典范。实际上，先人就是强调了文是人心的表露，人是创作的原点。其他如《书·舜典》曰：“诗言志。”《诗大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发形于言。”扬雄《法言·问神》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张戒《岁寒堂诗话》曰：“诗原乎心者也”，“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刘熙载《游艺约言》曰：“文，心学也。”诸如此类，都是表述了文学即原于人，是人心的创造。

“文似人”，即将文学看成人一样，是一个充盈生气、活力弥漫，乃至血肉完整的生命实体。因而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出现了许多渗透着生命精神或生命形式的理论范畴，如气、情、志、神、意、骨、髓、力、体，以及形神、风骨、筋脉、肌理，乃至主脑、眉目、诗眼等，至于直接用人体作比喻来批评文学问题的更是触处可见，如云“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节，有腠理，有骨，有髓”（王铎《文丹》）等。这种批评观念与批评模式的形成，是与《周易》以来重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精神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大有关系。六朝时期，受到医学、相术及品评人物风气等多方面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式批评思维相切合，“以文拟人”就蔚然成风。现代较早发现中国文论的这一特点的是陶明潜，他在1927年的《诗说杂记》中说：“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为比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诗道成焉。”后钱锺书或许受此启发，写了专文名《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讲的就是中国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

“文写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古人在论抒情、叙事、说理时，都离不开论人。离开了人，也就没有情，没有事，没有理。

“文为人”，古代的文论，毕竟以儒家的为正统，他们都是正面强调文章是为人所用的。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到后来在

文论中广泛地讨论人与现实、文与道、德与言、文与质等关系,以及提倡“怨刺讽谕”“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及“温柔敦厚”“中和之美”等时,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以追求符合人伦、实用功利为最终鹄的,且特别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人关注到文章的“不用之用”,要写得“有趣”“娱目”,对人能起到“怡性悦情”的作用。这就往往接近道、释两家追求自然、平和、清静等境界了。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为人所用。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以人为原点的看法,有人或许不同意,说这是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文学都是离不开人的。这看来很有道理,因为文学与人的关系是天下同理的。可惜的是,正在这一点客观存在的原理,中国自古以来是认识而强调的,西方的注意力恰恰就不集中在这里,即使在人道主义高扬的年代里,其对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其根源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天人两分的。日本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专家吉川幸次郎在几十年前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就发现了这一点,说:

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存在,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的行为中,最为重要的是语言文化;而语言文化是宇宙秩序的最好代表,这是中华民族的信念。

最近,据《文汇报》2016年3月22日报导,作为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副会长、刚退休不久的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也这样说:

儒学的原点是人,它从人这一概念的关系构成开始,将家庭角色和社会关系作为完善道德的进入点。这与亚伯拉罕宗教截然不同。

报导文章还概括地说:“安乐哲说这是中西方对于‘人’的概念的不同解读所导致的文化差异。……以此为切入点,安乐哲找到了他的中西比较哲学的突破口。”其实,这何尝也不是中西文论比较的突破口。

在思维方法方面,中国文论也有其特点,这就是重在直觉体悟。在中国古代“具象思维”的影响下,注重凭直觉去体验、品味与描绘作品的整体风神,而不致力于将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从而去剥取概念。在具体表述时,习惯于用取象比类的手法,将相似的形象、相近的情景等,通过比喻、联想而使之能够理喻。它的观物态度,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将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批评者尽量贴近、融入批评对象之中,去切身体悟作品的精神与价值,而不是主客两分,人与自然相对峙,批评者站在作品的对面,以个人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去解剖作为客体的对象。《论语·八佾》载孔子与子夏讨论《诗经·卫风·硕人》中的诗句:“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这里《诗经》中的原句本是赞美庄姜的漂亮,而孔子从中体悟出“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美丽的画是从白纸上描绘出来的。子夏再从此中悟出人应先以仁义为本,然后再加上礼乐修养,以达完美。孔子因此而称赞子夏可以与他讨论《诗》了。这里没有知性的思辨,没有逻辑的演绎,就在对笔下美女的直觉中,体悟出人生的哲理。道家则更加排

斥理性的辨析和周密的推理,强调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是不可辩说与言传的,即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庄子更倡导以体悟的方式去获得心灵的安宁与自由,认为要认识世界和万物的本质,与直觉体悟相比,理性的思辨逻辑与明晰的语言概念总显得苍白无力:“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后来释家,特别是唐宋以后,宗派林立,但都强调体悟,以超越日常逻辑与思辨推理。他们对文论的直接影响更大,以致如“意境说”“妙悟说”“现量说”“神韵说”等,都与直觉体悟式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表现形态方面,中国文论的特点是即目散评。所谓即目,即写于阅读直觉的当下;所谓散评,即显得并不完整与条贯。这实际上是直觉体悟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现。在中国古代曾有过一些经年累月写成的较有条理、略成体统的文论之作,如《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诗薮》《原诗》等,但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大量的的是在直觉思维的主导下,将即目或即时体悟所得,信手挥洒而成,因而多为散体的点评。先秦时代,夹杂在经、史、子书中的碎言短语,本也不是严正的论文之作。两汉之后的序跋、书信,夹叙夹议,也只是或多或少地镶嵌了一些文论的意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出现了几部相对有论证、成体系的作品,但在势不可挡的直觉思维的潮流裹挟之下,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作品还是几成绝响。当时即使冒出了诸如《典论·论文》《文章流别论》这样以“论”为名的作品,但实际上并未成为像样的逻辑周密的论文,以后也罕见以“论”名篇的文论之作。唐宋之后,诗格、诗话(包括词话、曲话、文话等)、评点,乃至以诗论诗及词、文、曲、稗等兴起,各体的文论之作百花齐放,但大都是由评论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见,随手作评,点到为止,往往给人以一种零散而杂乱的错觉。这就难怪陈钟凡在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这样说:“中国古代的‘论文之书’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直觉体悟的内在思维与即目散评的外在表现相结合的批评形式呢?我的认识是:

第一,多数著作是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第二,这种形式恰恰特别适合于对文学的批评。文学不是切实的自然科学,也不是抽象的哲学玄理,它的基本属性是以感性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审美观照。作者的情与思都融化在具体的形象之中,读者要欣赏与理解作品的美,及其情与理,都只有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入手,才能有所把握。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正是批评者从即目的具体的感性形象入手,经过切身体悟,从而使评者与作品乃至作者的心灵相沟通与融合,这就为评者领悟作品的整体风貌与内在精神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中国式的批评本身带有具象性的特点,有时就直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作为批

评,如敖陶孙《臞翁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魏庆之《诗人玉屑》)本身就富有文学意味。不少批评文字写得情、事、理相统一,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内在思维与表现形式,比起西方重逻辑、重思辨,看来存在着一些弱点:如不深究事物共相与殊相的区别,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概念的理论;推理与分析的逻辑不严密;一些用具象标明的概念、范畴等内涵不明确;论述缺乏系统性、条贯性等。

但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由直觉体悟思维而形成的即目散评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大都是评论者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来的批评,而不是戴着某种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因此,中国式的理论批评是一种鲜活的而不是僵硬的、冷漠的文学理论批评,能给人以一种“不隔”“不玄”的感觉,容易被读者接受。所以在其所谓短处,也正可见其所长。

总结以上的一些想法与做法,就不难看出这部文论史是怎样努力去做到“守正”与“创新”。

所谓“守正”,就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编这部教材,既注意从当前教学的实际出发,又重视从中国文论的实际出发。

从当前教学的实际出发,即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切实地了解与把握中国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精神与范畴,感受到中国的文论是有体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为以后进一步研究中国文论打好基础。

从中国文论的实际出发,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文论的精神、话语、范畴出发,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从中国文论的原始文本出发,既注意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又注意处理好中与西的关系。就古与今的关系来看,既看到它们之间有隔阂,有矛盾,又看到它们之间毕竟是血脉相连,基因相通,我们希望能在继承传统优秀精神与总结当下鲜活的创作经验相结合地基础上去建构好当代的科学的文论。就中与西的关系来看,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文论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各有特点,各有短长。中国近代文论变革时,西方的理论曾经被大力引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们注意了中国的文论自身也在不断地改良与革新,西方的文论被引进而成活的,都经过了消化与改造。我们不自妄自菲薄,过分地夸大西方文论的作用,去抹杀自身变革的基础与无视中国文论的优点。同时也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充分地注意到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重要性。

我们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革新了中国文论史的编写模式。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或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不同名目,出版了不下数十种中国文论史著作,但其基本的编史模式,都是在借鉴、运用近代欧洲的文学批评史的编史路数,对中国的文论史料进行选择与梳理后,将历代的批评家与论著以时为序一一评介。本书的编写,打破了以往的编写模式,第一次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核心范畴为纲目,以点带面,系统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演变历史。

第二,突出了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点。全书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贯彻

始终,依据原始而可靠的文献,进入历史文化的语境,阐明演变过程中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政治更替、思想文化潮流和文学实践,从而论述了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批评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根源、物质和文化基础,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最基本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的“原人”精神、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和即目散评的表现形式。

第三,助推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有一些著作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编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有所探索,但一时难以跳出旧的框架,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裹足难前。有的中国文论的研究者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文论自成体系,曲解中国文论的原义与精神,将中国所有的范畴、概念、命题与思想等都作为国外某种文论体系的语料或点缀,消解了中国文论的元气。本书的编写,在打破以往的编写模式和突出中国文论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系统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内容、重要范畴与基本术语,旨在梳理与彰显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为当前重建具有中国特色、又立足当今现实,并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文论体系铺路。

以上是我们的目标,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其成败得失,恭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黄霖,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论”焕发青春

王汝梅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由十二位专家组成编写组，集体合作编撰，黄霖主编，李春青、李建中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是“中国文论”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祝贺这一重点教材的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版，必将推动“中国文论”的深入研究与促进“中国文论”课程的改革。

“中国文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至今已近百年。1914—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汇集出版，即《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培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讲稿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下册于1947年出版）。继郭著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部分，到1943年分四册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1946）。后来的批评史著作，在草创时期建立的框架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围，扩大篇幅，逐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研究形成热潮，老中青结合形成一支雄厚的专业队伍，满怀热情地发掘新材料，开拓新领域，加强了小说戏曲理论的研究，整体推进，重点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几个重要文化事件：（1）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郭绍虞任会长，周扬任名誉会长。学会编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2）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四卷出版，同期出版了一卷本。（3）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分批陆续出版。（4）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举办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郭绍虞为导师，徐中玉任班主任。从全国高校选拔了三十名学员。请王元化、吴组缃、程千帆、钱谷融等专家讲课。这批学员返回学校，开设中国文学批评课程，成为中国文论教学骨干。《宋代文学思想史》作者张毅、主编《中华古文论释林》的李壮鹰、《明清小说理论史》作者周伟民等都是师训班成员。笔者的《金瓶梅》研究坚持三十五年，起步在师训班的选题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大家戏称师训班为“中国文论”的第一期黄埔军校。古代文论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上，有学者建议举办第二期“中国文论”研讨班。而且这一学科的研究，有一个明确战略目标：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努力。到1995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出版，

以“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将“中国文论”学科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丛刊》大型的资料汇编,自1993年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也是一部带有总结集成性的研究成果。

重点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在以上所述历史背景下,继承了老一辈研究成果,广泛吸取了近三十多年的新成果基础上编撰的。全书共分五章,概括论述中国文论史奠基、成熟、深化、总结、新变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每章概述中都有一节专门论述此一时期的文论的特点与演变。该书在结构体系上打破了理论家与理论著作交错论述的体例,而是以重要的理论范畴观点为纲。如果把每章的概述,去掉后结集,则成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概论。

联系课程改革,从教学实践的层面,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讨。

第一,回归原典,引导学生(或读者)与文论家对话交流,吸引学生走近古代文论经典文本,品尝古代文论的原汁原味,这是首要的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感受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古代文论选讲》之间不协调。朱东润的《中国批评史大纲》、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都不设概论、概述,直接讲授各历史时期的文论家或文论名著。把哲学史、文学史的一些内容写入概论,有助于加深文论的背景。但是如果写得很概括、笼统,反而可能冲淡对文论的品尝与理解。在教材中如何处置概述、简介属于常识性内容,值得商讨。以文论家、文论名著为纲,容易掌握与记忆,也容易让古人古语活起来,走入当今的文化生活。重点教材把文论家简介插在各章节中间,不细看以为是正文,读到此处才知道是一个插页,使读者感受到不够顺畅。

第二,重点教材绪论将学习古代文论的方法要正确处理古与今关系,正确认识中外关系,注意以中化西,洋为中用。同行学者都认识到中外古今融会贯通的意义。由于个人知识结构的局限,真正做到是极其艰难的。在教材与教学中体现也不容易。重点教材第309页讲“真幻”这对范畴工时说:“虽然也可以包容在现代文论所说的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内,但也略带着一点现代所说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意味。”这里注意在理论范畴上的古今贯通。是否还可以从古代小说论总体与现代小说论贯通,从而给当代作家学习明清小说艺术经验提供借鉴。

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运用中外比较的一个典型学术个案。他主张中外古今贯通,认为“以古释古”只完成了研究工作的一半。

第三,“中国文论”是富有生命力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情本体,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论诗学。在教学中,我们要立足古代文论,把握传统与当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通过教学把古代文论引入当代语境。盘活文献、用活经典、激活古代文论,把古代文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向青年普及,向大众普及。

刘知幾《史通·惑经》中,从史传文学描写人物角度,提出“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启示小说作家借鉴史传文学的实录精神,以塑造小说人物的复杂性格,克服美则无一不美、恶则无往不恶的单一化倾向。吴组缃先生应邀去山西大学讲学,山西大学学报请吴先生题词,即题赠了刘知幾的名言:“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使刘知幾的写人物理论进入了现代生活。